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5.04.009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潘红玉, 罗永恒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基于新质生产力与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的内在逻辑关系, 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提出知识结构跨界整合、创新能力场景嵌入和数字素养深度耦合的三大核心要求, 同时揭示当前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存在的知识结构割裂、产教协同低效、动态调整机制迟滞以及评价导向偏差等困境, 提出加深“一制四化”培养模式的实施深度、打造政校企共同育人的生态格局、优化人才培养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创新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的系统性路径。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财经类专业; 拔尖人才; 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25)04-0051-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应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些重要论断及部署, 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正引领各行业的深刻变革。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创新为关键^[1-2], 其核心在于技术革命性突破^[3-5]、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6-7]、产业深度转型升级^[8-9]。在财经领域,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为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的深度渗透与融合创新, 其正在驱动金融业态、商业模式、风险管理、决策支持等发生颠覆性变革。同时, 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绿色发展理念, 也催生出绿色金融、ESG

投资等新兴领域, 对财经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提出新的综合性要求。在这一背景下, 财经类专业作为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领域, 其拔尖人才培养显得尤为关键。文章聚焦新质生产力在财经领域最显著、最迫切的体现维度, 即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趋势下, 拔尖人才培养面临的核心挑战与亟需探索的创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培养与之相符合、能够充分运用新质生产工具、产生创新生产价值的新质人才。新质人才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决定因素, 教育肩负为未来人才培养提前布局的重要使命^[10-11]。李奕的研究强调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 认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创新^[12]。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亟待促进教育理念的更新、培养模式的升级、供需匹配的优化以及国际链接的畅通^[13]。新质生产力对高等教育, 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

收稿日期: 2025-05-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3YJC79010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3YBA28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406; 202502)

作者简介: 潘红玉(1989—), 女, 湖南冷水江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产业链治理研究。

养中存在模式单一、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等问题,可通过调整培养模式和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来摆脱困境^[14]。数智时代“新财经”人才的素质结构至少包括新财经价值观、新财经知识结构、新财经创造精神、新财经创造性能力和新财经人格特征等要素^[15]。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新质生产力的宏观层面分析,对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缺乏深入探讨。虽然有部分研究涉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但尚未针对财经类专业的独特性和需求形成系统性的培养策略。基于此,文章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如何通过课程体系优化、实践教学强化、产教深度融合等具体措施来培养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

1 新质生产力与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的关系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是指那些不仅具备深厚的财经专业根基和卓越的通用能力(分析、沟通、学习),还拥有高阶、复合、引领性的核心能力特质,使其能够定义问题、引领变革、创造价值的人才。一般财经人才通常是指掌握扎实的财经专业基础知识(会计、金融、经济等)、具备常规业务操作技能(如会计核算、信贷分析、市场分析等)、熟悉行业基本规则和流程,能够胜任标准化、程序化工作任务的人才,其核心目标是有效执行。这两者的核心差异在于从解决问题到定义和重构问题、从应用技术到融合创造技术、从执行优化到战略引领和价值创造、从掌握工具到深刻理解并驾驭技术伦理的跃升,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是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经领域变革的驱动者,而非仅仅作为适应传统技术工具运用、既有业务框架执行,或是被动回应产业变化态势的追随者。在财经类专业领域内,拔尖人才培养同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内在逻辑关系。

1.1 新质生产力对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提出新需求

新质生产力在财经领域的具体化首要体现为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成为核心生产工具、平台成为重要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对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的知识、能力与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要求,其核心聚焦于以下方面。

第一,知识结构的跨界整合需求。这是应对

以数字技术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动态演进的基石,也为未来理解和服务于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变革所需的财经专业知识交叉打下基础。数字技术同财经业务的深度耦合,要求人才培养跨越传统学科的壁垒,搭建财经+技术+管理三位一体的复合型知识架构。

第二,创新能力的场景嵌入需求。这种能力是驱动包括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在内的各类新业态、新模式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涌现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引发的产业变革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引导人才从知识应用者过渡到问题重构者,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验中必须打破传统风险控制框架的认知边界,采用批判性思维构建适应性监管模型。

第三,数字素养的深度耦合需求。数字素养已成为财经拔尖人才在新质生产力时代最基础、最核心的通用素养,是其有效参与数据驱动决策、驾驭智能工具,并服务于各类新兴产业财经活动的必备条件。数字技术发展势头迅猛,财经领域的决策愈发依赖数据驱动,今后财经领域的大部分决策将会以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基础,这对拔尖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不仅需要掌握Python 量化分析、机器学习建模等技术手段,还需要有敏锐的数据伦理意识与强大的算法诠释能力。

1.2 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

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整合者与价值创造的驱动者,在新型劳动者培育、新型劳动资料革新以及新型劳动对象拓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一是新型劳动者的塑造维度,财经拔尖人才借助知识重构与能力升级推动劳动力要素的质态变革。2019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搭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财经类专业开设金融科技、智能会计等交叉课程,将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传统财经知识体系,培养既掌握RPA 流程自动化等技术工具的人才,又拥有战略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本领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新型劳动场景里,可突破传统金融业务线性思维,利用技术工具同商业逻辑的创造性结合,实现生产要素

的恰当配置与价值增值。

二是新型劳动资料的创新维度,财经领域的拔尖人才运用技术研发与工具革新驱动劳动资料智能化转变。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财经领域的劳动资料正从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模型向智能投研系统、监管科技平台等数字工具演进。

三是新型劳动对象的拓展维度,财经拔尖人才依靠专业重构与范式革新,推动劳动对象实现数字化延伸。伴随数字资产、碳金融等领域的崛起,财经服务的对象已从实体资本扩展到数据要素、数字孪生体这类虚拟资产。2023 年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增设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专业方向,这正是对劳动对象形态变迁的一种反馈。

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的困境

当前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面临诸多亟须化解的关键矛盾,其中知识结构割裂、产教协同低效、动态调整机制迟滞以及评价导向偏差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困境是制约财经拔尖人才培养有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数字化维度)发展的关键障碍。

第一,知识结构割裂与跨界整合的困境。新质生产力期望人才形成财经+技术+管理的复合型知识格局,但现行培养体系仍然以单一学科的逻辑为主导方式,难以跟上技术渗透与产业融合的趋势,极少的财经类院校开设区块链金融、智能风控等交叉课程,同时这些课程大部分为选修模块。课程设计多数采用学科知识+技术工具的机械堆砌,未对分布式账本技术原理与金融信任机制重构等底层逻辑进行系统整合。这种分离式培养容易造成学生虽然掌握 Python 量化分析技能,但是难以在跨境支付协议优化、碳金融衍生品设计等场景中实现技术逻辑同商业价值的创新性融合。此外,师资队伍知识结构固化的问题十分显著,仅极少部分财经教师有跨学科研究背景,从而限制课程内容深度交叉融合。

第二,产教协同机制陷入悬浮困境,技术创新同教学转化脱节,导致教学体系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前沿(尤其是金融科技等)的发展步伐。当下校企合作普遍停留在实习派遣、案例共享等浅层的交流互动上,未能建立问题联合研究—技术联

合创造—人才联合培育的深度耦合机制,只有部分财经高校和企业一起建立联合实验室,同时合作项目多集中在数据可视化等低阶范畴,此类浅层合作容易导致教学内容跟不上产业技术的迭代节奏。供应链金融的区块链新型共识算法等前沿技术,从研发到进入教学体系往往会出现一定的滞后现象,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协同机制尚未形成。企业顾虑研发成本与知识产权,缺乏深度参与的主动性。高校现行评价体系以论文产出为重点,很多教师便把产教融合当作额外负担。

第三,动态调整机制面临制度层面的约束,人才培养的敏捷性欠佳。即使教育部构建起专业目录动态更新机制,但高校内部仍留存专业设置僵化、资源配置有惯性倾向等问题,教育政策从认定政策相关问题、开展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评估、结束等,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周期。传统学分制与固定学制不易适应技术快速交替更新的特性,造成人才培养周期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这种滞后现象不仅影响学生对最新技术与知识的掌握,还制约他们毕业后迅速适应产业发展。

第四,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滞后,抑制师生创新活力。当前采用的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发表与课题立项,忽略对学生技术实践能力、产业问题处置能力的考核,只有极少量的财经类院校将技术成果转化效益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指标,导致教师缺乏投身产教融合的内在动力。学生评价仍然以考试成绩为主导,缺少对跨学科项目实践、创新成果商业化潜力等维度的量化分析,此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不仅催生论文教授与应试优等生,还抑制师生的创新积极性,使人才培养难以契合新质生产力对价值创造能力的核心诉求。

3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

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既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促进金融体系自主创新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其培养成效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位势。

一是加深“一制四化”培养模式的实施深度,破除学科存在的壁垒,核心创新在于打破传统学制与学科壁垒,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知识快速迭

代与拔尖人才成长周期规律的贯通式、融合化、前瞻性培养框架。“一制”也就是本、硕、博培养贯通的机制,旨在解决分段培养造成的高阶科研训练迟滞与知识链条断裂问题。所谓“四化”,就是多元化、国际化、个性化和数字化方面的教育。其中,多元化反映在学生选拔与师资配备两个方面,整合高校、金融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跨学科师资队伍力量,构建区块链金融、碳会计与数据建模等课程组合,把分布式账本技术、机器学习算法等新质生产力要素深度掺入金融学、会计学等核心课程体系。国际化着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采用CFA(特许金融分析师)、FRM(金融风险管理师)等国际认证体系,进一步强化跨境金融合规、ESG投资等课程双语授课,使学生拥有国际视角、能够投身全球化竞争。个性化要求在维持思想政治教育和基础理论教育的基础上,基于学生个体特点来明确高年级阶段培养方向,开设智能投研、绿色金融等模块化课程,支持学生凭借职业兴趣自主规划学习轨迹。数字化既要求教育教学资源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又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数字素养,跟上数智时代的步伐,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当作载体,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数字素养以及智算技能,以及处理数智时代问题的能力。

二是打造政、企、校共同育人的生态格局,优化培养环境。新质生产力推动财经教育跨越校园边界,搭建相关部门引导—企业协同—高校主导的立体化育人体系,超越传统点状合作。就资源整合层面而言,联合央行与头部金融科技企业一起建设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开放同花顺iFind、Wind终端等实时金融数据接口,为学生构建真实市场环境下的量化交易与风险建模平台,解决教学环境脱离真实商业环境的问题;在实践强化环节,开办数字金融双创基金,支持学生参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设计、碳金融衍生品开发之类的真实项目,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在师资升级维度方面,实行“双师型”教师认证制度,配好配足师资力量,着力推进导师制度建设,吸引优秀教师和专家学者加入,构建达到国际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为学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教师资源和全方位指引,形成自我造血、协同进化的育人生态系统。

三是优化人才培养的动态调整机制,提升适应性。为降低政策变迁过程时滞引起的利益损

失,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认识政策时滞问题的基本概念及产生根源,查找解决教育政策时滞问题的路径,加快政策更新速度。高校应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同时改革学分制和学制,引入灵活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适应拔尖人才个性化探索与技术快速迭代,使人才培养周期与技术变迁相匹配,允许学生根据产业需求和技术发展,灵活选择课程和学习路径;还可以借鉴项目式学习理念,开展跨学科项目实践,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掌握最新技术和知识;建立产业技术动态监测与教学内容快速更新机制,实时调整教学内容,确保学生所学与产业需求同步,提高学生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四是创新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带动价值生成。为消除传统评价重学术轻应用的弊端,在教师评价环节,应减少对论文发表和课题立项的过度依赖;在学生评价环节,应构建一套以技术成果转化效益与产业价值贡献度为核心的评价框架,构建选拔、培养、绩效三位一体的拔尖人才培养统筹协同体系,从全面客观的角度评价学生综合能力与科研潜力。除传统的考试评价之外,采用项目成果评价、学科竞赛评价、创新能力评价以及实践能力评价等,全面评定学生的综合实力,采用大数据技术绘制能力雷达图,实时跟进学生在数据伦理、算法优化等维度的成长进程;邀请企业高管加入毕业答辩的评审团队,重点考查解决方案的产业应用价值,如合规成本降低率、金融产品创新收益等相关指标。建立拔尖人才成长档案以记载学生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技术贡献以及相应的商业转化成果,并作为其职业发展的核心要点,促进人才培养从学术达标向价值创造转型。

4 结语

财经类专业拔尖人才培养是一项既复杂又系统的工程,需要相关部门、高校、企业联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协同推进。在这一推进的过程中,高校应当充当主要阵地,要绝对坚守教育规律,借助动态响应机制适应技术迭代的节奏,需要坚守金融向实的价值内核,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同时也需要借助场景化教学,以产教项目的协同共生、跨学科课程的重新构建以及能力本位评价为途径,培养兼具数据治理、算法解释与绿色金融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相关部门应

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投入,为企业与高校的深度合作搭建桥梁,共同构建有利于拔尖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高校共享技术与实践资源,为拔尖人才提供真实的项目锻炼与创新实践机会。

参考文献:

- [1]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2] 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23(6):103-110.
- [3]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 [4]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77-85.
- [5] 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 [6]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 [7]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8] 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23(11):59-66.
- [9]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 [10] 祝智庭,戴岭,赵晓伟,等.新质人才培养:数智时代教育的新使命[J].电化教育研究,2024(1):52-60.
- [11] 李玉倩.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2):122-129.
- [12] 李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教育贡献——来自首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10):11-14.
- [13] 姜朝晖,金紫薇.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4(1):108-117.
- [14] 刘法贵,刘建厅,杨建伟.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等学校拔尖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策略[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04-108.
- [15] 潘忠文.数智时代“新财经”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为例[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3(5):121-128.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op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AN Hongyu, LUO Yonghe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herent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op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put forward three core requirements for top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ross border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scenario embedding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nd deep coupling of digital literacy.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op talent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ch as knowledge structure fragmentation, inefficient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sluggish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orientation deviation. It proposes a systematic path to deepen the implementation depth of the “one-system and four-in-one” training model, create an ecological pattern of joint education by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optimiz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novate a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competence as the cor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inance and economics; top talents; innovation ability

(责任校对 徐宁)